

## 新銳文化工作坊上課心得

助理吳詠宜記錄 1996.9.13-14

1996年9月，一個燠熱的秋天午后，天空偶爾飄過幾朵雲。中央大學的校園因尚未開學顯得更加安靜。接近兩點時，通往文學院的路突然地熱鬧起來，原來這天是新銳文化工作坊開課的日子。

來自中壢地區及遠從台北、新竹、台南等地風塵僕僕趕來的新學員們坐在教室中，用期待與羞怯的眼神正打量著這個陌生的環境。兩點過5分，在眾目睽睽之下一位身材高大的女人逕自往台上一坐，同時開口說話：「我不是藍博洲，我是新銳文化工作坊的策劃人，也是英文系的老師。」她是何春蕙教授，在藍博洲上場之前簡單的介紹了成立新銳的動機，主要期待吸引中壢地區居民與中央大學做一種資源上的結合，並企圖在大台北主流文化區外成立新的文化據點，由本工作坊提供較邊緣的、非主流的、新銳的文化題材與中壢居民互動。因此邀請知名的作家、歷史研究者藍博洲先生擔任新銳工作坊的探路者，並獲得文建會的經費支持，在中央大學推出。

接著是一位蓄滿落腮鬚、帶著一條不離手的舊毛巾、穿著T恤牛仔褲涼鞋的人走向臺前。面帶靦腆的笑容，他只簡要的自報姓名——藍博洲，至於學員們很想瞭解有關他的背景資料，會在稍後用影片裡自我介紹。學員們沒有影片幫忙自我介紹，所以都一一用口頭敘說報名的動機和個人基本資料。學員們真可謂“臥虎藏龍”，有編纂中壢市誌的行政人員、台南德化堂附設德化學園的執行秘書、台大經濟系研究助理、桃園縣立文化中心編審、一元布偶劇團工作人員、三峽國小老師、自由編劇家、廣播節目策劃人、新竹縣立文化中心人員、平鎮中學老師、師大歷史系學生、政大廣電系學生、和中央大學各系所的學生等等。他們大多是因為對田野調查有興趣，或者想更進一步涉入台灣的歷史而報名「書寫民眾史」的活動。其中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學員中的男性比例不到四分之一，令人懷疑是否新一代男性對文化和思想的興趣比前一代降低了很多。

休息過後，大家移步到視聽教室觀賞藍博洲準備的影音節目。首先他播放張大春訪問他的「縱橫書海：尋訪被煙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在30分鐘的影片中，藍博洲始終菸不離手的抽，回答問題的時候，眼神總是落在遙遠的前方，菸頭不斷竄起的白煙迷濛了他的眼睛，彷彿也模糊曖昧了從他嘴裡說出的一字一句。然而藍博洲的工作正是致力挖掘被官方論述所湮滅的台灣近代史與人物，好讓真相早日撥雲見日。

昏黃的視聽教室閃過一張張的相片，我們清楚的看到郭琇琮、鐘浩東、林如堉、簡國賢、林至潔、蔣碧玉等人的臉孔。透過藍的旁白，竟能感受到在那瘦骨嶙峋的軀體中散發出一股如山的勇氣，似火的熱情。他們正值年輕有為的黃金歲月可以為了祖國、為了同胞的自由幸福毫無眷戀的犧牲生命。這些人是誰？他們正是一群沒沒無名的台灣小人物；這些人在做什麼？他們在以自己的鮮血寫下一頁頁的台灣史！小人物能成就大英雄，被掩蓋的史實也會有重見天日的一天，這就是藍的工作，同時也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台灣人的責任。

最後，藍播放了一卷錄音帶「幌馬車之歌」。演唱者不是歌星，演唱時也沒有伴奏，若沒有上過今天這一堂課，歌只是歌。然而新銳的學員聽到了舷外之音，聽出了隱藏在音符後演唱者歷經歲月的滄桑與當事人的不堪回首。藍博洲

的作品範圍以台灣近代史為主，包括日據時代台灣學運、原住民霧社抗日事件、二二八事件、1950年代白色恐怖。藍在主觀認知上力求客觀，努力尋訪當時歷史的見證人，詳盡整理各類資料，「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是他的敬業態度。

首次的相互溝通，到場的學員雖然陌生，還有點靦腆，然而藍博州的熱情和明顯可見的堅持毅力也逐漸感染學員，大家對工作坊的三個月相處也開始有所期待了。

第一次上課學員們的心情真是輕鬆不起來，因為大家碰觸到的是歷史上殘忍的、荒謬的、血腥的部份。儘管如此，學員們一定有她（他）們放棄週末下午做美容保養或參加兩性成長營或睡覺或看電視而願意來探究這段歷史的理由。也就是這一顆顆熱切的心鼓勵了藍，支持著新銳工作坊。次日的課程開始介紹工作坊的規劃和內容。何春蕙教授雖然曾在各大平面媒體撰寫專欄，以文化批判和社會現象分析聞名，然而過去兩年卻主要以性別議題方面的前衛論述和出版來面對社會。這次選擇和左翼文人藍博州攜手合作，耕耘在地的另一種禁忌的邊緣論述，就文化建設而言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由藍博州所提出的工作坊課程規劃十分詳盡，並且會邀請好多位重要的左翼思想人士，也會安排他們與比較年輕的左翼文化學者對話，課程的安排內容非常厚重，但是也有著一定的構想和活力。

「民眾史」顧名思義即有別於帝王將相的歷史，不同於才子佳人的故事，而是庶民和日常生活的歷史。但是由於傳統史觀的影響，人們多半以蔑視的態度來看到庶民的生活歷史，民眾史的研究者往往需要奮力蹲點，才能在被人遺忘的蛛絲馬跡中拼湊起平凡人物對歷史的支持和推動。創造並訓練這方面的動力和人才，正是工作坊最重要的任務和工作。

### 新銳文化工作坊上課心得 1996.9.20-21

9月20日藍博洲請到林書揚先生為學員簡述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背景。因為大部分的民眾對這段歷史的知識很缺乏，正好林書揚先生曾因1950年代白色恐怖被捕，坐了將近35年的政治牢，是台灣牢齡最長的政治良心犯。

60歲的林先生體格依然健壯，他並沒有為今天的活動盛裝打扮，仍舊以一身簡樸的衣著面對新銳的學員。一個坐過「白色恐怖」牢的人，他會如何看待「白色恐怖」呢？林書揚先生喝了口茶水，以他低沈的、略微沙啞的、帶著濃濃台語腔調的國語娓娓道來。

這個歷史事件的發生，要從中國大陸的內戰談起。國民黨在戰事不利後被迫退到台灣，1947年到1949年間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怕一些潛逃份子和流失的武器仍存流於民間，並且害怕對岸的紅軍攻打過來，於是展開肅殺行動。另外，決定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性格的，是源自日據時期左翼的反抗運動，當時總督府估計，這些人數將近5萬多人，而且在僅400萬人口的台灣島上有著動員10到15萬人的力量。這些人在台灣光復後多數被釋放，國民政府怕他們再一次集結，成為更大的反對力量。在當時的國際情勢中，美國則是以消

極、觀望的態度面對台海兩岸的政權，甚至當時台灣已沒有美援，因此蔣介石開始下令逮捕反對份子。但不敢處刑，怕二二八事件會再度上演，只好把這些人關著，禁止他們亂動的機會。

1950年6月25日爆發的韓戰是一個轉捩點。美國對台灣的國府再度示好，不僅派第七艦隊駐防，也提供美援，於是國府開始清除叛亂份子，展開了一連串的肅殺活動。

此外，這樣的反對勢力也是台灣新民主主義改革運動理念的體現。當時介入的人包含了各種社會階層，大家有著反內戰的意識，並且期待日本投降後能夠太平。但國、共間的不合促使統一的願望落空，內戰依然存在，讓這些反對人士挺身而出，為和平統一而努力。

休息的時間，林書揚先生和藍博洲閒聊，聽不到他們談話的內容，但是第一次看到林先生的笑容。只是輕輕的笑聲，淡淡的笑容，不知為何竟能讓人產生敬畏的心情。

接著林先生談他在獄中的生活情形。坐牢也要工作，每天都要到山上去砍竹子，而且規定大家都要砍一定的數量，誰的數量不夠，就要受處罰。但是有的人砍得少，有的人卻力氣大、砍的多，所以我們在下山前就把所有的竹子分配得剛剛好，大家的數量一樣多，要罰大家一起罰。

林提到，那時候每天都要唱國歌，可是只有站在前面的人才唱，後面的不唱。長官開始注意到他從不開口唱國歌，但是不會直接找林去，而是在一個深夜，先把排隊時站在林旁邊的人找去，問他（剛好是和林同案的朋友）：「你是不是站在林書揚隔壁？」「是。」「他有沒有唱國歌？」案友不能替林說謊，因為明明已經有人打小報告說林不唱國歌。如果他說林有唱，就是替林掩護；如果說林沒唱，那更會讓林送命。於是只能說：「我不知道，你們去問他！」。他被打了兩天才放回來，回來後對我說：「你小心，他們知道你沒唱國歌。」等到唱國歌的時候，有一個長官站到林嘴巴前兩公分，一直狠狠地看林有沒有開口。人越到這時候越是唱不出來，他就對大家說：「你們的一舉一動，我們都知道，雖然我們不能讓你們提早出獄，但是絕對有辦法把你們留在這裡。我知道你們中間有人不唱國歌，不要因為這樣下次讓你的家人在你的墳前哭著罵你不忠、不孝！」態度始終保持從容的林先生講到此處顯得有些激動，繼續說：「如果我認錯，從此開口唱國歌就會沒事。可是，『良心』呢？怎麼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人在獄中很苦，尤其精神壓力很大，如果不能早點想開，很多人不是撞牆就是發瘋。像林這種被判無期徒刑的人，若不能早早覺悟，當被判10年、13年、15年、20年的牢友要出獄的時候就會很難忍受，因為曾經一起受苦，他們可以離開而自己還要留在這裡。就有很多人受不了，然後撞牆啊、發瘋的。獄友們還會互相練習被槍斃的情形，找個人當槍手，然後練習自己死的姿勢：這樣倒好不好看？那樣倒可以嗎？槍手會說：「左邊一點，後面一點，我要射囉... 勺一尤！」，苦中作樂嘛。

教室傳出了笑聲，但是旋即又凝結在空氣中。有人輕輕的搖搖頭，也有人低聲說：「太誇張了吧！」。那些沒有說話的的學員卻在心裡對自己說：「還好，還好林先生死前的『預演』沒有成真！」

學員問林：「東歐解體、蘇聯瓦解，當共產黨都不相信共產黨的時候，為何您仍堅信共產黨？」林先生回答說：「我仍然相信共產黨。歐、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形式穩定，而它們的經濟、政治是建立在犧牲了第三世界的經濟、政治上。其實在蘇聯和中國還是有人相信共產理想，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等速的，有的國家快，有的國家慢，落後地區的資本主義趕不上先進的資本國家，只能靠集中有限的資源，重點式的運用在解決領土自衛、基本建設和人民生存權。共產主義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它是目前能夠照顧到大多數的人民。如果能證明中國的政權違反自然的法則，中國共產黨也會被淘汰。」

今天的活動在這段問答中結束。望著林先生離去的背影，思索著他今天演說的內容，想像著他坐牢的生活情形，於是想起聖經上的話，那是耶穌即將被釘上十字架前所說的：「死亡啊，你的毒牙在哪裡？」他們那些早已看透死亡的犯人並沒有屈服在死亡的陰影恐懼下，因為他們不曾因為死亡的威脅改變自己信念的忠誠度！而且，他們似乎更超越了死亡所帶來的「悲壯」，能用更輕鬆、彷彿遊戲般的態度迎接死亡。

現在，林先生是「政治受難者互助會會長」，以歷史見證人的角色站出來告訴我們年輕的一代那段被湮滅的歷史真相，並且鼓勵更多「二二八」及「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提筆寫作，或者打開刻意塵封的記憶黑盒，以口述的方式留給後代子孫一個大時代的民眾記錄！

#### 新銳文化工作坊上課心得 1996.10.4-5

10月5日，拜中央大學停電之賜，新銳的學員得以有機會在秋高氣爽的週末下午坐在文學館的草地上，藉著借來的發電機和電視，欣賞《我們為什麼不歌唱》這部影片。

苗栗銅鑼籍的受難人曾梅蘭歷經數十年的輾轉尋找後，終於在台北六張犁公墓的亂草堆下找到了當年「白色恐怖」政治風暴中被槍決而屍骨無蹤的哥哥徐慶蘭的墓塚，並且發現了一共201個當年被槍決而無人收屍的墓塚。《我》片即以這個事件為現實的基點，在台灣及大陸各地尋訪當年身歷白色恐怖的倖存者，進行挖掘歷史真相、恢復人民記憶的影像記錄。

影片以蔣碧玉女士清唱的〈我們為什麼不歌唱〉揭開序幕。接著開始進入一連串歷經「白色恐怖」的歷史見證人的時光記憶之旅。曾梅蘭女士帶著撿骨師到六張犁去挖墓，撿骨師還說：「再過幾年啊，這麼年輕的屍體就撿不到骨頭囉。」當初因家人付不出棺材錢而亂葬於此地的受難者終於被發現。這段情節使人聯想到另一部「白色恐怖」的電影《超級大國民》。片中白髮皚皚的男主角在竹林裡找到埋葬受難者的一大片墓碑後，他在每一塊墓碑前點起一根白蠟燭。薄暮時分，從竹林的葉隙間望去，只見點點的火光忽明忽滅。這時這位年近半百的男主角再也壓抑不住心中的百感交集，於是，號啕大哭。跳動的燭火猶如自地底下鑽出來的幽靈，伴著他洪亮的哀號聲，歡欣的、熱鬧的跳著舞！

受訪者之一的許金玉，一位瘦小的、滿臉皺紋、滿頭白髮的女士，對著鏡頭告訴我們她的遭遇。台灣光復後，原本以為終於可以苦盡甘來，所以當國民政府的軍隊來台的那一天，大家都自動自發跑去迎接。我們心裡真的好高興

喔！以為可以翻身了...可是在「白色恐怖」的時候被抓起來，關了十五年...我們又沒有做錯，愛國沒有錯啊，為什麼要抓我們？我真的覺得我們那個時代的人都好可憐哪...。說到這裡，那段痛苦的經歷再一次咬嚙著她疲憊的心，使她不由得哭了。此刻的教室好安靜，學員們有的低下頭，有的脫下眼鏡揉揉眼睛。藍博洲先生點起煙，走出教室。

片中交叉進行了許多受害者的訪談，包括郭琇琮的遺孀林雪嬌、林書揚(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羅慶增(苗栗三灣鄉農民)、黃逢銀(苗栗三灣鄉農民)、林昭明(桃園角板山泰雅族人)、羅坤春(苗栗銅鑼人)、黎明華(廣東梅縣人)。經由這些人的獨白，我們可以大致拼湊出當時「白色恐怖」的情況，否則我們很難想像今天的某地的某山坡竟是當時歷史發生的現場。時間的流逝總讓人們淡忘了一些事情、一些痛苦的經驗，然而透過這些歷史見證人的口述與回憶，人們的記憶正在甦醒，歷史的真相正在浮現。

片後主持人藍博洲(本片製作小組，以下簡稱藍)請到舒詩偉(大學講師，以下簡稱舒)、范振國(本片製作小組，以下簡稱范)、關曉榮(本片導演，以下簡稱關)、瓦歷斯·諾幹(原住民文化工作者，以下簡稱瓦)四位來講點對電影的回應。

**舒：**(今天負傷出席)前陣子出車禍，大難不死，現在行動不便。但今天能站在這裡和大家一起看影片也算緣份，否則我大概要在另一個地方默默地唱歌給你們聽了。我自己在北埔做礦工的口述歷史，工作的這幾年產生了一些心得。假設今天你去採訪某個地方大拜拜的活動，你會怎麼做呢？一般人不外是帶著攝影機、照相機、錄音機到現場，然後就看到鎂光燈從早上到下午閃不停。有的採訪者可能已經和當地居民建立起關係，經過問答的方式就可以取得文字方面的資料，然後將這些第一手資料整理、發表、出版。身為一個研究者或民俗文化工作者這類角色，本身的定位很重要，在採訪時，人家為何一定要任我隨意拍照？有些採訪者根本不管當地人的感受，而且他們的採訪作品只向國外發表，卻對當地居民一點影響也沒有。我很重視採訪者的定位問題，大家可以討論。

至於《我》片，我大致與另一部西班牙電影《Good Fight》做比較。《Good Fight》講西班牙內戰，也是訪問曾經參與內戰的人及在內戰中的受害者，影片中可以看到斷手斷腳的受訪者。《我》片和《Good Fight》第一點不同在時間上：《我》片專講「白色恐怖」那一段歷史，《Good Fight》則從1938一直延續到1985年，時間相當長；第二，《Good Fight》不只講過去、現在，還包括未來，而《我》片有些地方不太清楚，焦點比較放在「過去」的部份。

**范：**我簡單說明一下我們拍《我》片的情況。這是我第一次拍紀錄片，而且大部工作人員都是新手。在開拍前我們開了十幾次的會議來討論要怎麼拍攝1950年代白色恐怖，要如何勾勒出它的輪廓，好讓觀眾可以很快地掌握到重點。但是在客觀環境像財力、影片時間(90分鐘)等限制下，本片仍有許多不足的地方。《我》片是紀錄片，它不同於紀錄電影。紀錄片應該對事實加以蒐集、組合，然後加以解釋。以我們製作者的立場是不加評斷的，任由民意去論斷，我想這是豐富「未來」的可能之一。

**瓦：**我大致談一下原住民在白色恐怖時期的情形。日據時代原住民的生活情況

還算不錯，國民政府來台後對原住民社會開始破壞。舉例來說，當時對原住民最重要的醫療器材不但沒有被政府用來照顧人民生活，反而被國民黨拿去賣錢。在白色恐怖時代被國民黨大量撲殺的都是知識份子，可是這些原住民知識份子並沒有所謂的「由對白色祖國的失望，轉成對紅色祖國的期待」這種心理。

**關：**90 分鐘的內容有太多限制，但還是有責任說出局部的真實。將歷史復原的任務是艱鉅的，不能單透過影像來傳達，我期待能有更多像博洲、瓦歷斯這些從事文字工作的人，用文字更完整的繼續完成這份任務。

### 學員提問

**學員：**訪問者是否會刻意引導受訪者回答預設好的答案？

**關：**當我站在鏡頭後面時突然有一種想法：我這個鏡頭就代表了「台灣社會」，像許金玉那樣的受訪者，在被禁錮了這麼多年以後，終於有機會能夠對台灣的社會說話！這個鏡頭可以安撫她，可以讓她盡量訴說自己回首一生的心聲，就像對著台灣社會迫不及待的說給大家聽。我認為自己的角色是一個聽眾，讓許金玉盡情的說出心中的話。

**舒：**有一種採訪是「掠奪式的採訪」，這種方式比較不顧慮人的感受，希望拼命從受訪者口中挖出他心中一塊最不願被碰觸的地方。

**藍：**舉個例子吧！當蔣碧玉女士躺在病床上時，我們關心的是她的安危，所以我們是以一種探望長者的心態去拜訪她。可是有另外一組採訪小組是一進去病房就架起燈光，可以說完全拍攝蔣碧玉女士的死亡過程。他們那種做法也在採訪啊，你能說他錯嗎？不過至少我知道我不會這麼做。我們面對受訪者時一定要說些話來引導他的情緒，因為你知道像受了長期禁錮的人，其實很難將他的心敞開。而且在與受訪者尚未建立起信任關係時，他們甚至會懷疑我是不是「特務」？因為我問的問題真的和當年特務問的一樣，只是方法不同罷了。當然若是他不願意講，我們也不可能刑求他啊，只好暫時放棄，等待下一次機會。

**學員：**為何片中只見台籍、客家籍，卻沒有一個外省籍的受訪者？

**藍：**影片中有外省人，只是剛好他是說客家話的外省人。因為我們知道白色恐怖並非與大陸無關而完全孤立在台灣島上，所以我們也有到大陸出外景，並且找到了大陸籍的受害者。我們拍攝的動機是想要釐清事實，然而 90 分鐘的時間實在很難照顧到全面。

**關：**很多人看完後都反映要看兩三次才懂，這是因為片中的人物較多，比較複雜，讓人容易搞亂。所以最好是事先閱讀過關於白色恐怖的資料，會比較快進入狀況。我有的朋友覺得很沈悶，看到一半就走了。但是讓我頗感欣慰的是，有年輕人看完後告訴我他們很感動。

**學員：**請問你們是用什麼攝影機來拍攝？

**范：**我們是用 16 釐米攝影機，這和一般的 Video 不一樣。它的特點是不能無限制的拍下去，所以我們要對受訪者有所瞭解，控制他說話的時間。16 釐米的成本反而比一般的高，可是它可以保存得很久。你應該看得出來我們是新手，有時候畫面不穩，有時候會出現失焦的情形，我和曉榮扛攝影機都

還會摔倒哩！

藍：我本身很喜歡用樸素的方式拍片，因為沒什麼噱頭，沒什麼裝飾包裝，能更接近真實吧。這部片可以挑戰大家習慣已久的好萊塢式的視聽感受。

學員：我看這部影片會比較偏向「人」的部份，我看到許金玉和林書揚兩個人態度的不同：許金玉好像比較抓住「痛苦」不放，似乎走不出她這一生所遭受到的不幸帶來的痛苦。可是我看林書揚先生，包括上次聽他的演講，都讓我覺得他比較「超脫」，這讓我很好奇。

關：我想這與個人的信仰也有關係吧！林書揚先生不是共產黨員，但是他的思想一直屬於左翼，你們應該也看得出他並不是因為被國民黨關才傾向共產黨。他說過：「如果共產黨是無能的政府，人民一樣要起來推翻它。」再說我們還要想想看，許金玉女士雖然只關了 15 年，出獄後國民黨特務幾乎斷絕她任何工作機會，生活非常困頓。林書揚先生假釋後已經是另一個時空了，這也會影響他們的生活態度。其實人都是要活下去的，有的人比較幸運，可以平平順順的過一生；有的人運氣不好，生活總是顛沛流離，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我們沒有親身經歷過他們的處境，所以我想我們沒有資格去批評誰應該痛苦，或不應該痛苦。

瓦：一般人容易將焦點放在影片所賦與的歷史意義和價值上，但是我更關心的是：看完這部影片後你有沒有受感動？其實一部 90 分鐘的影片絕對無法完整的告訴觀眾「白色恐怖是什麼」，歷史必須是人類不斷的學習。假如對白色恐怖仍有不懂的地方，就應該動手去找資料，去尋找自己想要的東西，我希望我們能建構一套屬於自己的歷史觀。

轉眼間天色已經暗下來，文學院草地上的空氣因此增添幾分涼意。主持人藍博洲提醒大家該回去吃晚飯了，今天的活動才告一段落。

### 新銳文化工作坊上課心得 1996.10.11-12

10 月 11、12 兩天的課程主題分別是：〈內山開發史的研究與楊梅地方文化史〉和〈台灣開發史的研究〉。這週的主講者「陣容堅強」，主持人藍博洲先生請到黃卓權先生（地方文史工作者、關西高農老師）、曾年有先生（地方文史工作者）、尹章義教授（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台灣開發史》作者，聯經出版）來演講。

黃卓權老師講〈內山開發史〉部份。從他對客家文化的熱情，很容易感受到屬於年輕小夥子的幹勁！雖然他已經五十多歲了。據黃老師說，台灣的開發從清朝的乾隆時代就開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沿海開發，又稱「前山開發」；第二階段是丘陵開發，又稱「近山開發」；第三階段是原住民開發，又稱「內山開發」。在這三個階段的開發過程中製造出很多漢人的大家族，這些大家族和朝廷的關係很密切。隨著漢人的發展，原住民的土地便漸漸的減少，而且原住民開始被漢人同化。

漢民族與原住民之間並不是非常和睦，為了經濟問題常常發生磨擦。當時的生番出草會割人頭。漢民族的無頭鬼信仰有幾個忌諱：第一，不能埋到家族墓園，必須就地埋葬；第二，不能立碑；第三，不能進祖牌；第四，不能在祖

譜留名。因此原住民割人頭的習俗冒犯了漢民族祭祀的大忌，當漢人抓到生番就會當場開膛剖肚煮人肉吃，漢人還覺得其味可口，取名「山羌肉」，連當時的日本報紙都有記載。胡適的父親做官的時候經過埔里（布農族與泰雅族的交界），將其所見所聞紀錄下來：「北番出，軍民爭殺之，屠而賣其肉，其骨焚而為膏，其價甚昂。」從這段台灣史，我們可以看到異民族之間互動的情形，而且還有漢民族姓氏之間的仇恨與械鬥。

接著曾年有先生播放幻燈片介紹楊梅地方文化，同時還讓學員們聽聽看 70 多歲的老奶奶所唱的客家山歌。在昏暗的視聽教室裡，當曾先生講解圖片時，他黝黑的皮膚更襯托出面露笑容而展現的潔白牙齒。幻燈片的內容主要是楊梅地方的風俗民情，還有許多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寺廟建築的照片。曾先生先從饒富童趣的諺語引領學員們進入屬於楊梅的地方文化史，「四月八，楊梅叭叭跌」，「楊梅」的確是一種果實的名字，農曆四月初的時候成熟，熟了就掉下來，滿地都是成熟的楊梅。其實「楊梅」本來叫「楊梅壩」，「壩」是溝谷的意思，大家一定不知道胡適先生曾經在楊梅上班喔！而且故宮的國寶也曾暫時放在楊梅好一段時間，因為楊梅地方的地理位置很好，是在一個山谷裡面。而且楊梅離台北很近，更重要的是，萬一共產黨攻過來，一定是先打台北這種大都會區，楊梅便成為「退可守」的地點。

接著曾先生為學員解釋一個陌生的名詞——「伯公山事件」。事情的由來是這樣的：在楊梅的伯公山上有許多珍貴的百年大樹（在幻燈片中我們已經看過這些樹葉遮天的老榕樹，老人們在樹下悠閒的喝茶、下棋、唱山歌，小孩子則在樹蔭下追逐、嬉戲），但是有人建議要在伯公山上蓋一座全國最大的三關廟，因此要砍掉這些大樹。這些老樹早在漢人未進入之前便已經存在，而且錫福宮前的廣場始終是當地居民生活的重要場所，如果此廟能保存下來，10 年、20 年後，它很可能是全國唯一的。另外，如果沒有這些老廟，也就沒有了歷史。因此在 1994 年夏天發起了護廟保山救樹的活動，也就是所謂的「伯公山事件」。在楊梅地方鄉親父老連續 18 天的抗爭下，終於救下老廟和大樹。當曾先生描述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時，他的眼睛閃閃發亮，很自然地流露出他對楊梅地方的關懷與身為楊梅人的驕傲。

曾年有先生覺得做為一個地方文史工作者，一定要從常民生活去著手。因為那就是文化，那就是歷史。請大家看下面這段，是曾先生自己寫的。

楊梅，係一介民風純樸介客家庄頭。（係一介：是一個）

錫福宮，係楊梅介開庄大廟、八大里民介信仰中心。

伯公山，客家人撈土地公喊做伯公，（撈：把）

小小介山屯上有盡多頭珍貴介百年大樹。（盡多頭：很多棵）

1994 年夏天，發生了護廟保山救樹的「伯公山事件」，平常、善良、憨直介鄉親父老大自家，（大自家：大家、眾人）成功地護衛客家先祖留下來的介的財產。

1995 年 6 月，眾庄人鬧鬧熱熱舉辦第一屆楊梅百年文藝季。今嘍日，（今嘍日：今天）錫福宮、伯公山撈山頂介百年大樹全部留到了，（撈：和）已經成了楊梅人最驕傲介文化資產，絕對不再分人破壞，（分：讓）永永世世、長長久久...。



今暗哺，（今暗哺：今天晚上）伯公山頂山歌捱天，（捱天：歌聲繚繞不斷之意）隔壁鄰舍共下來，（共下：一起）唱到月光不肯走，（月光：月亮）唱到星仔不想轉。（轉：回）

這是伯公山閏八月社區音樂會中的一首歌曲，另外像〈老山歌〉、〈平板〉、〈挑擔歌〉都是請一位已經 70 多歲的老太太來演唱。當時現場的氣氛讓她很高興，所以她又即興唱了好多首。如果研究者不回到現場的話，根本沒有機會發現屬於客家人自己的這麼豐富的資料。對曾先生來說，從客家族群的常民生活出發去尋找歷史軌跡的原因，有政治因素也有族群情懷，而且其中更有他個人創作力量的來源。

尹章義教授談的題目是〈台灣開發史的研究〉。首先以人文的觀點來看，台灣發展史可分為六個階段：

- （一）先住民自治期（西元 1624 年以前，漁獵經濟）；
- （二）荷蘭西班牙殖民地時期（西元 1624-1662 年，掠奪經濟）；
- （三）鄭氏延平王國時代（西元 1662-1683 年，封建農業資本主義）；
- （四）中國清皇朝時代（西元 1684-1895 年，農業資本主義）；
- （五）日本殖民地時代（西元 1896-1945 年）；
- （六）國民政府統治時代（西元 1945-）。

在最早的先住民自治期時代，台灣南部還沒有大地主的出現。荷蘭人佔領台灣以後由「墾首」到大陸去招募農民到台灣來墾殖，供給這些人資金和生產工具以收取報酬，這位墾首就具備了「大租」的身分。這種投資不但數額大，同時風險也很高，所以很盛行「合夥制」。招募到的農民多半為同鄉或親族，所以地緣、血緣組織發達。比如說台灣當時最有錢的大姓都姓林，一是板橋林家，二是霧峰林家。但是像林本源這麼有錢的大地主，他同時也是別人的佃戶。由於猜想學員大概不相信，所以尹教授就帶來了歷史證據！說到此處，尹教授得意揚揚並且小心翼翼地拿出好幾張發黃的紙來，這些吹彈即破的紙竟然是林本源當佃戶時的收據！尹教授還保存有林本源的帳冊，可以清清楚楚的知道林本源可以收多少稅金。這些再古老不過的「古董」的的確確告訴後人某段不為人知的真相。

台灣的現代化有人說是因為日本佔領台灣時所推行的，尹教授認為這是錯誤的看法。早在日本人來之前，清光緒元年起，在大陸推動現代化的名臣沈葆楨、劉銘傳等人相繼主持台政，致力於台灣的現代化；建鐵路、電報、電燈，設立新式學校，推動機器製造業。

尹教授提醒我們，台灣的開發以「集團」為單位，並不是像童話故事裡面的巫婆騎一根鋤頭就來開墾了，而且種子也不是今天種下去，明天睜開眼睛它就長到天空去了。農民要等一年兩年才能看它長大，才能收成，因此農業社會最好的祝福話就是四個字——風調雨順，或者「國泰民安」。尹教授很擅長用幽默的口吻告訴學員們嚴肅正經的歷史故事，從學員們開心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們很喜歡這種表達方式。

尹教授自己一直在做田野調查，因為做田調得到的東西特別豐富。有一位文人曾經說過：「放膽文章拼命酒」，如果和主人聊到高興的時候，他們一定會

喝酒，所以調查者絕對不能拒絕喝酒，而且要跟他們痛痛快快的喝！這也是尹教授做田調不喜歡帶女孩子去的原因，女生比較不方便嘛。有一次尹教授在大溪做田野調查，和朋友聊到很晚，也喝的很晚，結果那位主人打電話給他在淡水的的朋友，於是他們四部轎車就殺到淡水去，在淡水喝到凌晨。這還不夠喔，早上大家醒來後，他們又打電話給宜蘭的朋友，他們五部轎車又開到宜蘭去繼續喝，那天晚上就在礁溪洗溫泉。那次尹教授被他們灌醉了就倒在地上睡覺，主人覺得他實在很夠意思，為了「回報」他，紛紛打電話給他的朋友說：「尹教授現在醉倒在我家，他正在收集某某時代的地契，你們有的就趕快送過來，要在他醒來之前！」等尹教授醒了睜開眼睛，前面擺的滿滿都是他正在找的東西。這位白髮、白鬍子、白白胖胖的尹教授說得自己都樂不可支，學員們更是聽的津津有味，教室裡的氣氛很是輕鬆！

綜合前述台灣發展史的軌跡，台灣發展史有以下幾項特徵：

### （一）單一民族之優勢開發，衝突少而一體性高。

荷蘭、西班牙、日本等國曾經短期局部或全部統治台灣，三者都行「差別待遇」、「掠奪經濟」；也沒有定居型移民留在台灣，無法與台灣「一體化」。殖民政府撤離，影響力就消失。

中國人大量移民台灣定居。1684 年起設置和大陸一樣的行政區、實施相同的制度，是以台灣之文化、社會、經濟發展由大陸主導，迅速與中國「一體化」。

台灣移民雖福佬、客家等兩大不同「語群」，也從閩粵兩地帶來相近的民俗、宗教甚至於「衝突文化」。大體而言，兩大語群都是「漢人」，也都受「儒漢文化」影響，由同一政府統治，故而同質性高，相對的衝突、磨擦也比較少。

清朝中央政府由滿人主政，瞭解少數民族的處境，視台灣先住民為「天朝赤子」，土地只可租予漢人收取「番租」，不可買斷土地上層所有權，番租收入是以維持各社生計，故種族衝突也很少，先住民和平且迅速漢化。

### （二）對外貿易取向的經濟型態，海洋通路，利於貿易有無。

台灣盛產鹿和烏魚、熱帶栽培業的糖和靛菁、米、茶葉、樟腦等。貿易關係由各殖民母國主導，清代以中國大陸為主，樟腦、茶葉則行銷世界各地；日據時期以台灣日本為主，1950 年以來，則以美國、日本為主，近年台灣商人則奔走於全世界。

### （三）資本主義主導的台灣

「墾首」和「圳主」累積雄厚的資金，發達了「農業資本主義」，台南、鹿港、台北的「郊商」（貿易商）成為台灣的資本家；清末茶、樟腦貿易造成新興買辦資本家。日據時代光復以後工業及貿易以國營為主，國家資本主義發達，造就了以糖業帝國為主的商社財閥和總督府資本。

近年財團勢力高漲，政商關係由支配和被支配變成結盟關係，金權政治大興；資本家進而主導外交政策和海峽兩岸的關係。

尹教授覺得研究台灣歷史的好處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認識自己」。最近

喧騰一時的「宋七力事件」讓他覺得當作家也不錯，讀書寫稿的人一生的成就來自於筆桿、思想，追求知識已經成為「目的」，不再是「手段」而已，甚至可以說讀書已經是生活的一部份了。政治人物可以說最迷信了，才會去找宋七力，因為政治界起起伏伏很「無常」，許多叱吒風雲的政要靠打坐或去向宋七力「求智慧」來祈求他們的信心。但是讀書人有信心，信心從書本來，這是很確定的不必隨波逐流。尹教授希望從研究歷史或學問的經驗與心得，來對社會有一點點及時的幫助就很值得了。

新銳文化工作坊這兩天的課程內容相當精彩豐富，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這三位主講人，他們都表現出對研究台灣歷史的認真與熱忱，儘管黃卓權先生和尹章義先生已不再是年輕小夥子，然而他們兩位的工作態度絕對和正值壯年期的曾年有先生不分軒輊！

### 新銳文化工作坊上課心得 1996.10.18-19

10月18日工作坊邀請了陳映真先生來講民眾史的意義與內容。陳先生高大的身形和低沈的聲音使得課程增添了幾分嚴肅性。

課程主題是『民眾史』，陳先生說想先談談『民眾』的部份。他說：「『人』有兩種屬性：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自然屬性分析到最後，人就是蛋白質，變得很簡單。可是重點在社會屬性，因為脫離了社會，人就不能生存。換言之，人的生存一定有社會關係，比如說家族關係、職業關係、生產關係，影響最大又是生產關係。我們生活所依賴的商品就是靠人類的生產而得，生產關係不能由個人獨立完成，它必須要是團體組織。在這組織中大部分的關係，例如職業或行業，是可供自由選擇的。唯有『階級』不是完全自由選擇。在分工過程中掌有生產工具與否來區分位置的就是階級，而『民眾』就是處於階級中的同一群人；『史』呢，就是歷史，它是有變化發展的過程。所以站在某一階級位置的人之變化發展過程就稱為『民眾史』。」

可是，「民眾」到底是哪些人呢？陳先生強調，40年來台灣社會的發展史，不是總統院長部長將軍博士專家和大老闆創造的，而是無數勤勉樸素勇敢的小民眾，以他們的體力智慧血汗備嘗艱辛，付出重大犧牲所創造的。對於同一段歷史，有不同的寫法，也有不同的談法：幸福的人、有力量的人、在時代中受寵受惠的人....對歷史有自己的寫法和談法，但是沒有力量、無法分享社會進步的福祉的人，勤勞一生卻只能求一身一時溫飽的人，他們對同一段歷史卻有完全不一樣的讀法。民眾史就是從大多數居於社會底層的勤勞勇敢卻無口宣說、無筆特書的民眾立場，去看、去詮釋人和他們的生活，看人和他們的歷史，去思考人和他們的自然和環境，去究明人和他們的生命。

很多人說陳先生1985年創辦的《人間》雜誌是首次以「民眾史」立場回顧戰後40年台灣社會發展歷程的刊物，也就是意圖扭轉戰後由國民黨政府及資產階級所建構的台灣史觀，改以群眾的觀點出發，打造庶民階級的歷史。這個觀念的翻轉使得一群「沒有姓名」的普羅大眾成為了歷史的主角，而《人間》則和這些有口難言、有筆難書的人站在一起，以文字和圖像為媒介，從事對生活的深入觀察、發現、記錄、省思和批評，並站在弱小者的立場，對社會、生活、

生態環境、文化和歷史進行調查、反思、記錄和批判。這樣的民眾史有著鮮明的階級色彩和人文關懷

10月19日午後，天空開始聚集烏雲。不多久便下起雨來。這種陰暗溼冷的鬼天氣給人的不舒服，就如同牙疼時所遭遇的天昏地暗。牙醫師曾健民，同時也是今天的主講人一，走進教室就將那些不愉快一掃而空。對應於陳映真的高壯，曾健民顯得比較瘦小，他講話的時候始終面露笑容，是容易拉近醫生與病人之間距離的那種笑容。曾健民先生今天講的題目是「雙戰結構下的台灣社會性質與政治性質」，乍聽之下很難與曾先生的職業聯想在一起，繼而想到他也是「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就能釋懷了。

「雙戰」就是「冷戰」與「內戰」，兩者的結合影響台灣的社會相當大。「冷戰」起源於美國要保持維護並且擴展它的資本主義範圍，它運用的手段包括：建立國際貨幣制度，當然以美元為中心，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作戰組織，還有世界銀行。蘇俄就是美國發展擴張過程中遭遇最強勁的對手，因此美蘇兩國極端的軍事對抗就是最典型的「冷戰」。1945-49年冷戰的戰場在中國大陸，其間在1946-47年，美國曾調停國共內戰，調停失敗後，美國對中國的態度不冷不熱，國民政府節節敗退，美國因此將冷戰重心轉移到日本。1948年後，美國關心的問題便是如何從國共內戰脫身，1950年6月25號韓戰爆發，雙戰前線來到台灣。

1949年1月1日，陳誠宣佈戒嚴。2月，國庫、故宮遷台。8月，蔣氏重建情治系統。10月，美國CIA報告中說明，國民政府如果沒有美援，一年以後就會被中共解放，可以看出當時國民政府的氣數將盡。1950年韓戰爆發，對國民黨無異是一大轉機，美再次介入國共內戰，同時派第七艦隊協防台灣。蔣氏有了美國的支持，馬上展開一連串政治上的整肅活動，即為大家熟悉的「白色恐怖」。雙戰性質就是美國在台的冷戰意志與蔣氏國共鬥爭的意志，兩者狼狽為奸，他們有一致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政治層面的一致面是軍事反共；矛盾面則為蔣氏堅持一個法統中國，因此要反攻大陸。美國雖也支持反共，但不贊成蔣氏反攻。經濟層面的一致就是對安頓台灣的經濟有志一同；矛盾點則在於：蔣氏支持軍事財政，而美國欲培植依賴美國私人企業發展的經濟走向。

黨國體制與美援體制同時在台灣。軍事上，美援體制支持蔣氏的軍事反共機構，最具代表性的措施就是派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政治上，美援體制支持黨國體制對外的合法性與對內的正當性，以阻止中共勢力解放台灣。經濟上，美援體制簡直可以成為第二財政政府，不但彌補國民黨的財政赤字，還充益台灣物資，抑制通貨膨脹，生產肥料，改善交通運輸，扶助私人企業成長，並培養親美的經濟官僚，逐漸取代原有的黨國體制，塑造黨國控制下發展私人企業的外部體制。

「最近大家常會聽到一句話『咱台灣人』。『台灣人』是『民眾』嗎？不是！因為『台灣人』包含社會結構中各種階級的人，甚至是日據時代的台灣人和光復後的台灣人，還有李登輝政權的台灣人。這三種一樣嗎？當然不一樣！所以這句口號不過是一種政治上煽動性的口號而已。」此時有幾位學員正私下交換會心的眼神與微笑，因為他們昨天也聽到陳映真說過幾乎一模一樣的話啊！「英雄所見略同」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說到這裡不難發現，台灣的發展不是來內部的力量，反而是由於外部力

量造成。今天我本來還想繼續向各位報告 1950 年之後的情形，但是礙於時間關係，可能只能講到這裡了，謝謝大家。」藍博洲隨機應變的建議下週曾健民先生的演講內容可以延續今天未完的部份。此項提議獲得過半數學員舉手贊成。

走出教室時，發現校園的路燈都亮起來，雨已經停了，空氣因雨水的洗滌而變得清涼。曾健民先生演講到忘我時舞動的那雙手讓人不住多瞧兩眼，因為它非常非常白，是醫生特有的那種白。然而，不論這雙白手，還是陳映真有力的大手，或是藍博洲因長年東奔西跑而曬黑的黑手，他們都有一個相同的理念，那就是透過認識民眾史，書寫民眾史，進而瞭解關懷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尤其是屬於非主流的、弱勢的、邊緣的團體，發掘並呈現他們被犧牲、忽略的一面。在使命感的引領下，那一雙雙手正從不同的方位去開墾那個共同的理念。他們是如此熱忱，如此認真，如此嚴肅，也許人數不多，但是，就像雨後的夜空，稀稀落落的星星反而顯得更加閃耀動人。

### 新銳文化工作坊上課心得 1996.11.1-2

11 月的第一天，「書寫民眾史」的課程再次邀請到陳映真先生。今天演講的主題和上次有連貫性，上次的主題是「民眾史的意義和內容」，今天講「報導文學的定義和寫作」。暖洋洋的午後，教室比平時多了幾張生面孔，探問之下才知道他們是一般作者或民俗文化工作者這類角色，都是慕陳映真的名聲而來。

1970 至 1980 年代的報導文學開拓了過去台灣文學史上極其罕見的文類，寫作者更表現出文學的道德勇氣以及推動社會改革的理想，文學也因此成為一種社會實踐的手段。陳先生所創辦的《人間》雜誌就是報導文學最著名的刊物，他在創刊詞中寫到：「《人間》是以圖片和文字從事報告、發現、記錄、見證和評論的雜誌。透過我們的報告、發現、記錄、見證和評論，讓我們的關心甦醒；讓我們的希望重新帶領我們的腳步；讓愛再度豐潤我們的生活」。報導文學描寫了社會上卑微弱小人物的堅強、自尊、高尚的秉性，展現台灣少數民族的處境、命運和文化，批評長期積累下來的台灣環境與生態的破壞，報導弱小者的被害（如山地少女被邁入都市成為雛妓），描寫農村經濟的凋敝、農民生活與經濟的衰落，關注青少年文化（如同性戀問題、學生同居問題），發掘戒嚴時代被湮沒的歷史：如二二八事變，對解除戒嚴後湧現的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和民主化運動加以記錄報導等等。

報導文學關注的是底層大眾的生存現狀，展現弱勢群體的經濟困境，表達邊緣族群的精神訴求。這些群體大多生活於社會底層，經濟狀況不佳，社會地位卑微，甚至因為主流社會大眾的不理解而遭受歧視，經濟與社會權益更無從保障。《人間》雜誌因此以平等寬容的視角觀察、記錄這些在資本主義社會快速發展過程中被忽視了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與困境，呈現他們的無助、焦慮與堅韌。同時也關注環境問題與經濟問題，反思資本主義對社會組織結構及人類生存發展帶來的災難性影響，從而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並對政治、歷史等問題的揭露與批判，發掘還原被威權統治所淹沒的歷史，報導解嚴前後社會民主運動等。

11 月 2 日曾醫師再度前來，可能因為天氣的緣故，課室裡人比較少。「人少沒關係，反而覺得溫馨」，曾醫生順著藍博洲的話當開場白。「今天我接著講

台灣 1980 年代的政治經濟學。我對歷史的看法是從全面的、總體的角度來認識。要瞭解 1980 年代的社會，我們從 1950、1960 年代看起。那時候的台灣正處於所謂的『雙戰結構』——美援體制及黨國體制。在經濟政策上，黨國體制禁止發展私人企業，美援體制主張扶助私人企業，兩者有統一面與矛盾面，交互作用就形成了台灣 1950 年代的社會情況。歷史走到 1960 年代因韓戰爆發，遂完全走向另一個嶄新的局面。黨國體制的經濟政策鼓勵私人投資，保護國內市場，促進出口。這段時期稱為『獨裁下的經濟開發』。1960 年代的轉換結果也就是台灣資本主義轉換的階段。1980 年經濟奇蹟的產生要素都暗藏在這 20 年之間。經濟發展三要素——勞工、技術和市場。當時的台灣，技術和市場依賴美國。所以最重要的課題是考慮如何製造大量順服的勞工。教育體系為了配合這種經濟政策，課程設計以職業為導向。1960 年代，黨國體制以低勞工、低環保、低民主來創造 1980 年代的經濟發展。」

1960 年代後進入工業化時代，台灣本土資產階級開始茁壯，成為民主化的原動力。除了以上所說的內部力量，其它外部力量的激發使得這些複合的轉化於焉啟動。首先遭遇的是中美建交、台美斷交，影響所及，台灣政府對外的正當性消失，連對內的獨裁合理性亦隨之脆弱，美國因應此國際變化，在美國成立「與台灣關係法」。這項法案純粹是美國的國內法，它可任由美國單方面修改。可想而知美國對台灣支配力量遂行加深，同時台灣對美國的依賴也無形增加。這些外部力量加深黨國體制的脆弱性，連帶造成經濟的波動。到了 1990 年代的今天，台灣對美國的依賴程度下降，轉移到大陸的市場上。

經濟波動的過程反映政治轉化，政治經濟兩者互相影響。曾先生一再強調：「認識歷史一定要全面，不能看只看單面。有人說過：『對歷史的無知就對未來的盲目』。台灣未來的發展方向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各位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不要忘記影響我們國家前進的諸多外部因素。這些關係交織在一起表現的錯綜複雜，所以值得各位仔細分析，冷靜思考。」

連續兩週的課程，曾醫師笑著說大家若能聽懂七八成他就很安慰了，因為對大部分人而言，可能是第一次接觸這些內容。他還帶給大家一份書單，如果對於講的東西仍然有疑惑，不妨看看這些期刊論文和書籍，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 新銳文化工作坊上課心得 1996.11.8

校園內張貼的活動海報形容今天（11/8）的書寫民眾史課程內容是：「本世紀兩位不同年代的代表女性，將進行一場女人的對話」。主持人藍博洲邀請到林至潔女士和何春蕙教授，她們分別代表「1950 年代的革命女性」及「1990 年代的豪爽女人」。這場「世紀末的對話」會串連出什麼樣的新鮮話題呢？

藍博洲（以下簡稱藍）：今天很難得請到林女士和何教授來進行這場座談會。林女士在白色恐怖的肅清活動中坐了十年的政治牢，在我的書《幌馬車之歌》中有林女士和郭琇琮大夫的故事。郭醫生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台灣青年，1941 年進入臺北帝大醫學部（現在的台大醫學院）讀書，有很強烈的中國人意識，很可惜的，他在白色恐怖中被槍斃。何教授現在是英文系的副教授，也是活動力很強的女性主義者。首先我想先請二位介紹自己的成長背景。

林至潔（以下簡稱林）：我是在日本人統治的時代出生長大的。當台灣光復的消息傳來，大家的心情真是高興的不得了！為了歡迎祖國，我們都以快樂的心情學習三民主義，民族主義說要扶助弱小民族，啊，這句話真的是深得民心。當時的思想潮流認為資本主義一定會改善。可是陳儀政府接收台灣後，貪污、無能、剝削百姓！本來以為可以過著好日子，沒想到後來不一樣了...。說到此處，林女士原本從容且充滿精神的語氣變得有些微弱，偏低著頭，陷入片刻的沈思後，她恢復原先的精神繼續說：在還沒認識郭琇琮以前，我就聽過他的事，因為他很活躍，不論在專業或者人品方面，都能打從心裡叫人尊敬和仰慕。我是透過同學的介紹認識了郭琇琮。年過半百的林女士說到優秀的郭醫生時，仍難掩臉上的羞怯與驕傲。

藍：林女士小時候的家境不錯，因為她受過日本教育，所以她還能翻譯呂赫若的小說。現在請何教授談談妳的成長背景。

何：我出生在軍人家庭，尤其我家有六個小孩，以我父親月薪幾百塊的收入，生活的艱困可想而知，但是在那種貧困中自有一份安穩的感覺。當時已開始推行國民教育，所以我也可以上學，那時候總覺得父母偏心，依稀感覺到男生比較受寵，但是那時候還不能把它和性別聯在一起。我讀的是空軍子弟小學，我較早入學，比同年齡的人年紀小，但是身材卻比他們高大，衣服不好買，鞋子更難找，所以我只能穿男生的衣服和皮靴，騎車也騎野狼 125。因為我坐在那種小綿羊機車上，感覺像是一隻癩蛤蟆。對應於林女士的端莊，何教授輕鬆灑脫的說話方式不斷為教室注入笑聲。她接著說，大家看我這種打扮都問：妳怎麼這麼穿？我才開始警覺好像穿得不對，因為不像女孩子應有的打扮。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就在這種性別的夾縫中成長，直到大學才好一點。

藍：我家有九個小孩，性別歧視可以更清楚感受到。像我姊姊功課比我好，更有能力讀書，可是小學畢業父親就要她去工作，讓我這麼混也能念完大學。現在我想請問林女士：妳到底做了什麼事才會去坐牢？

林：我父親本身受高等教育，因此他希望小孩也要受高等教育，這樣我可以嫁給一個體面的男人。他送我到日本一個貴族家族去，要我在日本學習。我在那裡學習日本的生活禮儀，也到學校去讀書，感覺很苦。我還沒出生時，父親在母親懷孕的時候訂了一套《世界文學名著》，將要送給第一胎娃娃，不論是男是女。不過我父親看到我是女的還是有幾份無奈。小學四年級我就讀了《茶花女》、《簡愛》等世界文學名著。我最喜歡的是《基督山恩仇記》，常常在幻想水牢是什麼？結果後來自己真的去坐牢。這個歷史的巧合惹來一陣笑聲，然而台下那一張張青春天真的臉龐可否體會林女士講自己過去辛酸的經歷？有一份「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的豁達心胸。她接著說，小說影響我的正義感，讓我對當時社會很流行的童養媳風氣有了反省和思考，一方面覺得自己很幸運，一方面開始想能為她們做些什麼？我想這就是資本主義的人道關懷吧。

何：教育是一個能改變我們社會地位的途徑，然而我所受的一直都是打罵教育，而且越努力越是挨打。我還記得有一次我數學考九十八分，被老師打了兩下，只因為沒有考一百分，在那個當下我是完全沒法接受這種教育邏輯的。我喜歡讀課外書籍，和林女士一樣我也很喜歡《基督山恩仇記》，只不過我喜歡讀得部份是主人翁如何練功爬升，然後如何規劃報仇。我也看武俠小說，這和

自己當時所處的社會位置有很大的關係，青少年啊，都夢想能突然有神奇的功力。到了高中，基督教剛傳進來，我有機會去參加各種讀經班，順便練英文，讀過聖經，在青年團契講過道，到了美國後接觸激進神學，它成為我的啟蒙思想，因為發現過去瞭解的神學偏向和平的、個人靈修的方式。激進神學卻類似武俠小說，傾向改變社會的現狀，所以後來就離開了制度化的教會，投入激進神學的思考。

藍：何教授這條女性主義的路走得很曲折，原來和神學還有關連，等會再請妳繼續說。因為剛剛林女士對於坐牢的原因跳過去沒說，那是不是請妳談談怎麼和郭琇琮認識的？

林：從小的教育一直要我成為賢妻良母，我又是在溫室中長大，等於天之驕子般的受寵。偶爾，我在報上看到郭琇琮的文章，對於某些觀念我的抱怨讓我的同學聽到了，她說要介紹大家認識。和郭琇琮第一次見面，他邀請我們去看看他們怎麼幫助女性的生活，於是他要我們到「山海樓」，那是一家妓女院。當時覺得這個人不正經，去了之後看到郭醫生和他的同事在妓女院幽暗的地下室醫治一位小女孩，小女孩全身都是梅毒，我從來沒看過這種病人，心中很害怕。郭醫生要我去跟她聊天。他們計畫將小女孩送到醫院裡治療，將負責一切費用。這些經驗讓我慢慢改了想法，包括對自己、對郭琇琮、對台灣的社會。在他的啟蒙與鼓勵下，我也投身社會運動。跟著他，我慢慢放下「賢妻良母」的身段，變得像隻「母老虎」。

何：我在美國除了自己讀激進神學、存在主義，也趁著寒暑假讀各種經典書籍，以補足在台灣知識單薄的缺點。我留美的年代是一美金換 40 元台幣的年代，所以必須去餐廳打工來減輕家庭負擔，養活自己。那個經驗很特別，不但觀察到文化差異，而且也看到資本主義對一個工作從業人員的操控方式，我正是從具體的端盤子、與顧客打交道、和廚師聊天種種方式去認識資本主義的操作方式。有一年夏天開始讀《資本論》，還參加讀書會，我們是在毫無壓力、極高興趣的心情下讀完《資本論》。我還修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課。1988 年我回國正值解嚴時期，經過馬克思、佛洛伊德的洗禮，我開始了對台灣社會的觀察。去國 12 年，台灣的變化之快令我相當震驚，我連回家的路都不認識，還要我母親帶我回家，可是女人的變化不大，她們仍在同樣的圈子中繞來繞去。有人說我的女性主義跟別人不太一樣，那是因為我加進了許多馬克思和佛洛伊德的理論。

林：剛剛聽何教授說了那麼悠閒的生活，我都陶醉了。我們當時的局勢很緊張，情勢逼得很多人站起來。我先生拿《群眾路線》給我看。我覺得好簡單，很好讀呀，因為我每天都在做群眾運動。坐牢之後，我的思想人格才真正成長。在獄中要讀書，我的國語和英文都是在坐牢的時候學習的。出獄後，正好我父親的同學開學校欠護理老師，我就去了，之後還到士林高中、中正高中、文化大學。因為坐過牢的身分被知道就一直被趕，最後我到了淡水工商專科學校，在那裡教日文、台灣文學。

何：為什麼我將女性情慾當作主力戰場？因為身體就是人的生命的物質基礎，而建立在身體經驗上的自我感覺和情感一向就是調教女性的重要力量，驕女人要收斂、含羞、退縮。女性主義者在思考如何塑造新女性的時刻，當然應該關注身體和其中的慾望如何構成了女性在位置和力量上的不足。今天在資本



主義消費社會裡，女性的身體情慾似乎開放了，變得多采多姿，然而這些看似新鮮的情慾面貌迎來的卻仍然是老舊的性別道德規範和譴責。消除女性在情慾上受的歧視，對我來說很重要，因為這些歧視不是來自個人的狹隘觀點，而是來自文化和社會結構的滲透。為什麼我們的社會對女性的情慾會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限制？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問題，也是一個有關社會正義的問題。這方面的運動思考，和林至潔的工作比起來，可能平淡多了，看不出重要性，但是這些身體情慾的問題若不解決，對女人來講，不但在人生中是一項耗費，也無法改變女性的心理侷限。

林：今天和何教授對談，我想藉機提出對於今天婦女處境的幾點看法。第一是夫妻財產，民法尚未修正前，妻子的財產都是先生的，可是先生的財產不和妻子共享，民法修正後情況才好轉。第二是婚姻暴力，我的學生常常被喝酒的先生拳打腳踢，結果她先生發生意外半身不遂，手抬不起來，腳也踢不動了。我的學生好高興喔。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先生會打我，那個時候恩愛都來不及了，怎麼還想到打架呢？第三是女性的工作權，女性的家事工作量比男性多很多，待遇不能和男性相比，有的公司有「單身條款」的限制，對女性更不公平。第四是外遇問題。男人外遇把性病、畸形兒帶進家中，這些傷害往往要由女性來承擔，女性的身體成為男性慾望的「殺戮戰場」。還有牛郎的社會現象，我不知道什麼是牛郎，就要男學生帶我去看，他們問我有沒有錢，我說沒有，他們就說我不能去。以上種種問題讓我覺得我們的社會福利體系並不健全。

何：大家有機會就要把握社會運動。每年11月12日工人運動的秋鬥遊行都會走到像是經建會那樣的機構去丟雞蛋，對社會的不公發出聲音。如果你一直在雙連坡，就會以為全世界的人過得都像你一樣，但是實際上你可以走出雙連坡，看看外面的世界，認識不同的人，認識不同的生活面貌。

藍：今天的對談我想就進行到這裡，因為已經超過五點了。如果大家有問題，可以私下來和林女士、何教授討論。我們謝謝林女士和何教授。

#### 新銳文化工作坊上課心得 1996.11.09

11月9日，林書揚先生再次出現在書寫民眾史的教室中。今天林先生要和中央大學哲研所的卡維波教授討論「兩個世代的《資本論》」。主持人藍博洲首先說明他設計這堂課的用意：《資本論》實在是太長了，總是沒有讀完就放棄，所以今天可以由《資本論》是一部怎麼樣的書為主題來開始，先請「老左派」林書揚先生開始。

林書揚先生（以下簡稱林）：謝謝藍博洲給我這個機會能和年輕人討論這本馬克思的巨著。與卡教授比起來，本人算不上研究，只是對馬克思的《資本論》有強烈的認同感，算是一個忠實的讀者。我的成長年代時期是日本殖民地的社會，什麼時候知道有《資本論》這本書呢？我出生在台南縣麻豆鎮，鎮上有一個公會堂，就充當圖書館，沒有書庫。我常常到那裡看日本的漫畫，記憶中最角落的大書櫃中放滿了大部書，像世界宗教大全、世界神話大析之類的，最上面有一套三大冊的《資本論》。我十二、三歲的時候第一次認識它。中學二年級太平洋戰爭爆發，那本書就不見了。有一次看到兩個年紀比我大的青年學生站在

我家門口，他們以一問一答的方式，一個人問「什麼是共產主義？」另一個回答說：「沒有人特別有錢，也沒有人貧窮。」當時隱隱約約知道這本書很重要，一直沒有機會好好去認識。被捕前半年，第一次看完《資本論》，至今仍有些內容只看得懂字面的意思，可是不知道它真正要表達的是什麼。我們若要著手改變社會，《資本論》提供一個很好的依據：是什麼、為什麼、怎麼辦。馬克思從對現狀的瞭解出發，進而改善現狀，它是一本具有科學精神的書。

藍：現在請卡維波先生談談你是如何接觸《資本論》的。

卡維波(以下簡稱卡)：我成長的年代是個對「共匪」思想全面封鎖的時代，接觸匪書的結果可能會導致入獄，一般台灣學生不太可能讀到馬克思的任何作品。由於受到當時黨外運動即鄉土文學運動的影響，我在1979年出國後便開始積極地去直接瞭解馬克思的思想。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幾乎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常識，很多美國人在高中時代就讀過「共產黨宣言」，許多批判及運動性的思潮，像女性主義及環保主義等，都至少在發展的初期借用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模型，挪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範疇概念。起初幾年，除了《資本論》外，我幾乎讀遍了馬克思及恩格思較有名的著作，我當時甚至自滿的以為已經對馬克思有相當的掌握了。當我好好地、仔仔細細地把《資本論》第一卷從頭到尾讀過一遍，這才見識到這本著作的全貌和複雜的內涵。大致說來，這是一本有時讓你覺得它觀念精妙、論證精采、修辭迷人、見解動人的大作，有時卻又覺得它在某些地方反覆說理、喋喋不休、冗長囉唆。但是整個的閱讀經驗基本上是頗為愉快的。

藍：為什麼《資本論》的內容很重要？就這個問題請兩位發言。

林：我寫的书《從二二八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裡有一篇文章也是討論《資本論》的。《資本論》非常龐大，有些入門書可參考。第一階段我建議用向阪教授的《資本論入門》當教材；第二階段，日本人的方法是集結工會帶著大家念《資本論》，這要花一年的時間。可以用和上朝的《經濟學大綱》入門；第三階段是真正的理論部份，也是未來當政者會面臨的部份。本人的功力只到第二階段，不過還有不懂的地方，就是只懂字義，不明白真正涵意。就內容而言，這是一部剖析資本主義的內在運動規律的經濟學著作。資本主義做為當代世界的最主要的支配性經濟體制，產生了近代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給資本家帶來史無前例的龐大且快速的利潤的積累和集中，同時也替無產階級招來受壓榨的悲境。而在壓榨與反壓榨的階級對抗運動中，資本主義的內容特性，它的結構及運作過程如何，對社會整體的發展性及桎梏性的辯證祕密在哪裡等等問題，都是規範被壓迫無產階級的鬥爭目標即階段策略的唯一根據。整個馬克思社會科學主義的特質在於它不止於是世界的解釋系統，同時更是改造社會的系統。因而被稱為「無產階級解放的總方法論」。而一切方法論所不可缺少的，客觀全面的現實解析和建構的成果，正是這一本《資本論》分為三卷，第一卷的內容是資本的生產過程，出版於1867年。第二卷是資本的流通過程，在馬克思死後由恩格思整編，1885年出世。第三卷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同樣經過恩格思的整理於1894年出版。另外根據馬克思生前的構想，以有關剩餘價值的學說史預定為《資本論》的第四卷，但因為恩格思在1895年逝世而為及實現。直到1905年到1910年間，始由考斯基遵照恩格思囑託分三卷出版。但以「剩餘價值學說史」為名，獨立於前述的《資本論》三卷。

卡：馬克思主義在人文與社會科學界的重要地位即影響是十分明顯的。首先，在每一學科領域或研究主題上都有馬克思主義的學派，以及馬克思主義立場或觀點的滲透。馬克思主義比其他人更完整與批判地建構出「階級」，並且使勞工成為學術研究的正當對象。階級與經濟關係密切，要瞭解社會，階級是不可錯過的面向。《資本論》的功用在於幫助我們看到社會的階級制度。（卡維波先生四點半先行離開，以下由林先生繼續談《資本論》。）

林：階級，就是各種不同生產關係中站在相同位置的人，有出賣勞力的，有擁有生產工具的。不同的生產要素必須結合起來，沒有勞工，資本家不足以成為資本家；沒有資本家，勞工還是勞工。區分階級的標準若放在「消費能力的高低」就錯了。社會上所有的財富都是通過勞力創造出來的，「勞力創造財富」這句話並不誇張。資本家獲得的利潤、利息也是勞工創造出來的。其實資本主義不是為了「滿足」需要，而是「創造」需要。馬克思是一位偉大的理論家，而且他還是實踐運動的領導者。他告訴人們所生存面對的是什麼樣的社會，這個社會有什麼問題需要解決，如何解決？《資本論》就是這樣一本書。人不只是經濟動物，也要過政治生活、精神生活。「階級」直指經濟階級，有了經濟階級才有政治階級、社會階級。社會的組成包含各種關係，當所有的人際關係，如家庭關係、師生關係、朋友關係都拿掉了，社會依然可以運作。唯有生產關係不能拿走，否則所有的關係會亂結合，人類自相殘殺。「沒有生產關係，社會就不能生存。」《資本論》真的很長，第一章也很難讀，馬克思本人承認第一章是最難的部份，很多人在第一章就放棄閱讀，不過之後就比較簡單了。毛澤東說：「《資本論》不是很長的麼，那又怎麼辦？這是好辦的，看下去就是了。」本人對《資本論》談不上研究，還是答應藍波的邀請來這裡和大家談，可能你們會有不同的想法，有機會我們可以互相討論。

藍：現在已經五點半，可能沒有時間讓你們問問題，不過還是可以私底下來找林先生。我想課程就到這裡結束，謝謝林先生。

### 新銳文化工作坊「書寫民眾史」結案報告

助理吳詠宜撰寫 1996.12.31

為期三個月的「書寫民眾史」課程已經結束了，在結業典禮當天，透過學員們作品的交流討論，我看到了學員們的用心。從三個月前對「書寫民眾史」這個名詞的陌生，到如今已能將心中對「民眾史」的一些想法透過田野調查的方法，以影像、文字傳達出來，學員們在這期課程中不論是知識的啟蒙抑或經驗的吸收都有很好的表現。

「書寫民眾史」主講人藍博洲先生對於課程內容的安排，以座談形式為主。由他邀請來的演講者包括林書揚、林至潔、陳映真、曾健民、瓦歷斯·諾幹、關曉榮、舒詩偉、范振國、曾年有、黃卓權、尹章義、何春蕙、卡維波等。這些演講者的共有特色是他們一直站在非主流的陣營，替弱勢族群發聲。藍博洲先生的作品明白告知，他努力調查的方向以台灣「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為主，這些長久被遮掩的政治歷史事件曾是台灣政府的敏感帶，讓執政者不願碰觸，不敢面對。藍博洲發掘被刻意掩藏的真相不遺餘力，並且由於他和當時的政治受難者建立良好的情誼關係，學員們才能在課堂上和林書揚先生、林至

潔女士兩位歷史見證人對話。

有時候，站在邊緣的、弱勢族群的陣線上需要超人的勇氣和毅力，因為弱勢者可動員的資源少之又少，而他們必須承受的壓力及歧視卻令人窒息。這些演講者中，有的為保存客家族群文化、原住民文化奮鬥；有的替婦女爭取權利；有的替老兵、雛妓、流浪漢等社會問題奔走呼籲…，若沒有「書寫民眾史」的機會，大家腦海中的台灣社會可能都將是光鮮亮麗，青春富裕的圖像。當這個社會不為人知的事實被揭露後，「書寫民眾史」的活動才有意義，否則一個太平盛世的民眾生活實難對人的思想、生命產生激盪。

在學員的作品方面，藍博洲先生認為學員人數較多(本次工作坊有 15 位)，且田野調查分配的時間(一個月)不夠長，所以很遺憾的，學員們沒有機會和藍博洲先生實地到民眾生活現場進行訪問、收集第一手資料的工作。折中的方法是藍博洲先生和每位學員溝通討論他們想做的題目，並將他豐富的田野調查經驗口授學員，讓學員盡量避免發生不必要的錯誤，使作品的完成過程比較順利。在時間和能力的限制下，仍然有三分之一的學員交出作品。

嚴格的說，作品有好有壞，不是每件作品都能掌握「民眾史」的精神。我個人認為《宵夜街的演進和頭家們》，是諸多作品中較標準的「民眾史」，因為作者(中央大學學生)親身訪談中央大學宵夜街的頭家，整理出近幾年來宵夜街的營業情況與中央大學學生消費習慣之間的關連。其他如《濱南工業區開發案對七股鄉的衝擊》、《採訪歌星》(以影像表現)、《響鑼鳴鼓鬧府城：試看台南近年劇場活動現況與發展(1991~1996)》，題目雖然有趣，卻比較缺乏田野調查——如和當地百姓訪談——的步驟，因此作品都少了「人」的臉孔。不過，學員畢竟不是專業的作家或研究者，目前只是業餘的對「民眾史」感興趣的人，所以能出現一兩份掌握住「民眾史」神韻的作品就是蠻值得的。

對於新銳文化工作坊第一期的活動，從回收的問卷調查表中知道，大多數學員給予正面評價，都認為從講員們的分享中學習到很多，也對特定議題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對於被掩沒的歷史更有著無盡的惋惜。在這些收穫中，抱怨多集中在田野調查因為時間和人力的限制，缺乏專業人士(如藍博洲先生)實地帶領，只能靠口頭指點，學員則必須自己去完成作品，常常感覺獨力無助。第二個抱怨則是參與的學員雖然有一些中央大學學生，但是其餘幾乎都來自台北，因此比較不能完成新銳文化工作坊成立宗旨中「…促進中壢地區互動」的理想。也因為這樣，就有來自台北地區的學員要求在北、中、南分別開課，這個呼籲倒是反映了在地更廣大的需求，或許未來文建會可以考慮擴大這個案子。另外，因為有許多外地來的學員，所以工作坊的上課出勤「保證金」制度發揮了很大的督促力量，未來應考慮維持。以上是學員們普遍反映的意見。肯定的部份，我們當然要維持下去，批評的聲音，更是下一期要改善的目標。

我也是自始至終全程參與「書寫民眾史」的人之一，我對課程的建議與學員們相同。同時，我更希望下一期的活動能吸引更多中壢地區的人士參加，畢竟台北的居民已經有太多資源可以利用，反而中壢地區比較缺少這種「另類」的活動。若每個城市、社區都發展出不同風貌的文化氣息而互相包容，台灣會是一個比較有趣好玩的地方。

在新銳文化工作坊內部營運方面，我提出幾點建議：第一是經費的部份。整體而言，各類範疇的金額我們都可充分利用，與經費評估表的預算大致符

合。但是在「雜支」部份，演講者提供的講義之豐富遠超過我們的預算，幸而有性／別研究室的支援來影印上課用資料，才能控制住雜支的支出。若雜支部份能申請更多的金額（提高至 25,000 左右），將會使活動更活潑，並且留存更多的紀錄。第二點，我個人應徵新銳文化工作坊助理的工作是因為它的工作時間（九月至十二月）僅四個月，能配合我的讀書計畫，明年一月起我將專心準備研究所考試。但是若決定將新銳文化工作坊發展成為長期的計畫，就必須聘請一位長期固定的全職助理，這樣一來，工作經驗的銜接才會順利，內部營運也能朝組織化、專業化的方向發展。而且對學員來說，固定的全職助理較易維繫工作坊和學員們之間的情誼，以我個人為例，從報名起到結業式止，前前後後和學員們電話聯絡、信件叮嚀不下十次，除了熟悉大家的名字、工作情況外，已經和部份學員成為朋友。

以上所言，是我擔任新銳文化工作坊全職助理的感想心得及建議，希望能對工作坊發展為長期的目標有些許幫助。